

当代社会学研究丛书
SERIES OF CONTEMPORARY SOCIOLOGY STUD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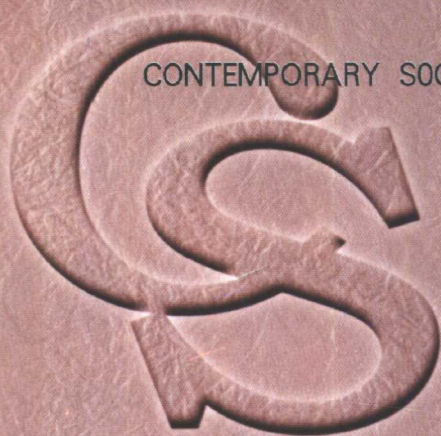
社区的实践

“超级村庄”的发展历程

PRACTICE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OF "SUPERVILLAGE"

折晓叶 陈婴婴 著

CONTEMPORARY SOCIOLOGY



浙江人民出版社

当代社会学研究丛书

SERIES OF CONTEMPORARY SOCIOLOGY STUDY

雷洁琼 主编

社区的实践

“超级村庄”的发展历程

折晓叶 陈婴婴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区的实践：“超级村庄”的发展历程/折晓叶，陈婴婴
著. -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12
(当代社会学研究丛书/雷洁琼主编)
ISBN 7-213-02170-2

I. 社… II. ①折… ②陈… III. 农村-城市化-研
究-中国 IV. C91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5370 号

当代社会学研究丛书
社区的实践——“超级村庄”的发展历程
折晓叶 陈婴婴 著

-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责任编辑 王利波
封面设计 王义钢
责任校对 李育智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激光照排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
(杭州环城北路 41 号)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2.75
字 数 32 万
插 页 2
印 数 1 - 4000
版 次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3-02170-2/C · 81
定 价 24.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第一章 导论	(1)
一、讨论的问题	(3)
二、研究的方法	(30)
三、涉及的村庄	(37)
第二章 宏观社会体系中的村庄与超级村庄	(45)
一、村庄资源的截留、开发和非农利用	(46)
二、村庄在宏观体系中的位置及其“越位”的发展	(53)
三、超级村庄的基本特征及“中间”形态	(58)
第三章 社区经济	(75)
一、非农经济的社区存在方式	(77)
二、社区经济的内部结构	(88)
三、社区经济的相对独立性与开放性	(94)
四、社区经济的乡土性和相对封闭性	(100)

第四章 社区合作体系	(105)
一、“集体”与“合作”	(106)
二、三种合作体系	(114)
三、合作行动的社会结果——共有物品	(133)
第五章 社区选择	(142)
一、案例中的选择结构	(143)
二、权威个人和群体的选择策略	(160)
三、组织遗产与制度选择	(172)
四、非市场的选择方式	(182)
第六章 社区建构	(193)
一、产权的社会构造	(193)
二、关系的人工建构	(220)
三、文化的社区解读	(237)
第七章 社区行动的规则体系	(258)
一、村社区规则的本质和体系框架	(258)
二、村庄的制度背景和非制度安排	(262)
三、村庄的制度安排	(266)

第八章 社区就业行动中的村民与外来人	(285)
一、村庄职业结构	(286)
二、就业——村民	(301)
三、就业——外来人	(314)
第九章 村社区发展与城乡关系格局的变化	(338)
一、村社区的超前发展	(338)
二、原有城乡格局的变化	(356)
三、边缘地带新的“发展极核”	(359)
结 语	(366)
参考书目	(392)
后 记	(401)

第一章 导论

引言

乡镇企业和农民流动,是近十余年来在我国农村改革中发生过的两件引人注目的大事情。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件在理论预期和假设上都与“城”或“镇”有关联的事,却都主要没有发生在城镇。统计资料告诉我们,从数量上说,目前70%—80%的乡镇企业办在村庄。^①小城镇人口在乡村人口中所占比重不高,人口聚集规模较小,农民就地“转移”和异地“流动”也在相当程度上落脚在经济发达地区的乡村。^②这种现象的存在,使几个与现代化和发展问题有关的基本假设并未能按照预期实现,即工业化的推进并没有大幅度减少农村人口(不只是户籍人口,而且是实际留在农村的人口)的数量;工业化与城市化特别是政策支持的城市化并未能同步进行,相反,却强有力地刺激了乡村社区特别是村社区的超前发展,造就了“工业村”的新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村自身城镇化的过程与工业化却是同步进行的。80年代兴起的小城镇研究,对于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关系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③,注意到了乡镇企业的崛起在中国基层社会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不过,小城镇的研究主要是以90年代以前农村发展的经验为其依

据的,不可能概括 90 年代以来农村发展的种种新情况、新事物,其中之一,就是出现了为数可观的、十分引人注目的“超级村庄”。

超级村庄的兴起,在小城镇理论之后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工业和企业制度不仅进入了村庄,而且在村庄扎住了根。在“工业村”基础上发生的“自然城镇化”过程,并没有彻底消灭乡村社会的结构和文化,反而使之对新引进的历来为城市所垄断的企业制度具有了适应力,在村庄基础上造就出了一种新的非农社会经济区。因此,村社区的未来前景也远没有像人们曾经设想的那么暗淡。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有两个基本事实不应该被忽视:一个是乡村工业化初期那种“村村点火”的情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场竞争优胜劣汰,在不断“挤垮”和“再生”中,现时顽强生存下来的村办企业,已有相当的数量跻身于国家优秀企业的行列;另一个是农村改革先行于城市,“离土不离乡”既是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也是农民认识到现有体制既限制他们进入城市,又提供了将城市资源挖入乡村即“请工业进村”的机会的情况下,利用本土的优势,在乡村实现集体流动的主动选择。^④正因为如此,他们才积极有效地再造了村庄,创造出了“超级村庄”这样一种新型的社区形态。显然,无论是认识村庄还是改造村庄,都需要从最基本的现实中抽象出新的概念框架,都需要新的思维和视角。

本研究将以 1993—1998 年期间由作者深入其中的几个有代表性的个案村的调查资料为依据,对 80 年代后期至 90 年代中期以来乡镇企业和村社区的发展,以及国家与社会、城市与乡村、个人与集体关系演化中出现的新情况,提出一些可供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一、讨论的问题

1. 村庄的内源性发展

我们在理论描述的意义上使用“内源性发展”这一概念。为说明它究竟何所指,源自何处,有必要先对与此相关的发展理论略加梳理,然后再来讨论本研究意义上的理论假设。

内源的现代化、内源发展战略和内源性发展概念及其分析框架

在现代化研究中,对于现代化的进程有不同的分类方法,其中一种重要的分类,是将现代化进程区分为内源的现代化和外源的现代化。通常,内源的现代化指社会变迁主要是由社会内部现代化要素不断成熟引起的,发展的原动力是在社会内部逐步成长起来的,是一种渐进式的和主动的变迁过程;而外源的现代化则指变迁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外部环境的影响,是外在的工业文明冲击原有传统的结果,是引进或接受现代化要素的过程,因此含有较多的被动成分。例如列维将英、美等最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称为“内源发展国家”,并对这些国家发展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尽管列维试图避免套用先发展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来解释后发展国家的问题,但他还是认为,只有最早实现现代化的几个国家的现代化,是在自己内部因素不断成熟的基础上发生的,而“现代化的后来者”(主要指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则主要是从外部采借的过程。^⑤

在发展理论中,对于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解释大致可以分为两个主要流派:一种理论认为,发展的动因与障碍均存在于社会的外部,应通过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及其变化的研究去解

释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如世界体系论和依附理论;而另一种理论认为,发展的动因与障碍存在于社会的内部,可以从外围体系本身找到变化的原因。在近年来的发展研究中,一些研究者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使发展成为可能的是内外部因素的结合,应从发展中国家的内部结构去寻找变化的主要原因。^⑥

出于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反思,70年代以后,“内源性发展”作为一种重要的发展思想,不断出现于发展理论与发展战略研究当中。但是,作为一种发展战略的内源性发展,与上述作为学术思想的内源性发展,在概念含义上不完全相同。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研究,内源性发展有以下四个特性:(1)内源性发展需要经济学范式的转换,不是以经济人而是以人类的全面发展为自己的终极目的;(2)内源性发展否定他律的、支配的发展,而谋求建立人类解放的社会;(3)内源性发展的组织形态与参与、协作主义、自主管理等有密切的关联;(4)内源性发展重视地区分权与生态系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立性与稳定性。^⑦内源发展战略强调发展的多样性,认为西方的模式并不是现代化的惟一道路,各个国家应当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也就是说,各国的发展不是西方文明的传播或复制,而是发源于后发展国家的内部,是主要依靠这些国家内部的力量实现的,因此在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尊重自己的传统。作为一种实践的内源发展战略,曾被联合国列为向发展中国家广泛推广的发展模式。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内源发展战略”的同时,日本学者鹤见和子通过对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研究,对“内源性发展”概念进行了新的理论概括。

鹤见和子将现代化理论中的“内源性发展型”与“外源性发展型”的分类用于对后发展社会的研究,指出后发展社会不仅仅是模仿先进社会,而且要立足于自己的传统,改造外来的模式,使之适

合于自己社会的条件,她把这种发展方式称为“内源的、自成的发展”。需要说明的是,她所说的内源性发展理论与一般现代化研究有所不同,其区别在于:第一,一般现代化研究中,研究的基本单位是社会整体,其边界是国家;而内源性发展论的研究单位可能是地区性的,是一个边界范围小于国家而且比国家受到更多限制的实体,如村、镇、城市社区网络等。第二,一般现代化研究以西方的历史经验为依据,而内源性发展理论则是以非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为出发点;与此相关联,一般现代化研究的发展模式是单一的,而内源性发展理论的发展模式是分散化的和多样的。第三,一般现代化研究中将前工业社会的传统视为发展的障碍,认为应尽快以现代文明替代传统文化,而内源性发展理论认为,应继承和复兴前工业社会在社会结构、文化和精神方面的遗产,以纠正或防止现代化的弊端。第四,一般现代化研究以经济增长为主要分析指标,而内源性发展理论强调一些非经济的指标,如人的发展、环境保护等等。^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村庄内源性发展假设

可以说,鹤见的内源性发展理论是我们研究的理论起点。我们同样在理论描述的意义上使用内源性发展的概念,而不将它视为一种发展战略。所谓内源性发展,是一种渐进式的发展过程,即是说发展与结构变迁是由社会内部现代化要素不断成熟、不断积累引起的,又是一种主动进取的发展过程,即是说发展的原动力来自社区内部,发展的主体是社区内部成员。这种发展虽然改变了社会原有的传统,但并不以打破传统或灭绝传统为先决条件,传统与现代要素之间存在着相当多的相互接纳与融合的关系。因此,我们的研究强调发展动力的内源性、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和发展过程的相对独立性,同时注重揭示发展过程中社区内部传统与外来要素相

互接纳与融合的深层原因。

当然,这一研究更重要的出发点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发展的实践。在对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研究过程中,我们感到,也许上述内源性发展不仅存在于最早实现现代化的那些国家,在某种条件下,在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的那些国家中也可能存在;不仅有可能存在于地区、区域、国家这样一些大社会中,在某些条件下,在村庄这样的小社会中也可能存在。我们认为,内在的变革因素是社会自然发展的基础。当我们讨论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现代化进程时,倾向于采纳影响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存在于社会内部的想法,并试图从内部结构与结构的变迁中寻找变化的原因,通过观察和分析外部因素如何融入内部因素、内部因素又如何接纳外来因素,来解释农村社区的发展过程。我们描述的对象是中国农村最基层的单位——村社区,并以农村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经验为依据,希望通过这项微观研究,来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基层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值得注意的是,农村的发展,主要不是城市文明冲击的结果,而是改革开放政策下农村社区内部契机发展的结果。回想农村改革初期,僵化、封闭的城市与生机勃勃、日益开放的农村之间那种鲜明的差异,我们很难想象是城市工业的主动扩散带来了发达地区以后十几年农村经济的高速增长。当然,我们并不完全否认超级村庄发展过程中存在外部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城市现代工业的影响,但是,从超级村庄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村庄内部的条件和因素,并且由于内因的不同,这种发展是分散的,发展的水平和发展的道路在不同地区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关注这些差异,是比较研究的基础。从类型比较研究的角度,我们提出如下一些理论假设:

第一,内部条件成熟的程度,影响着村庄发展的渐进过程和水

平；

第二，内部动力的强弱，决定着村庄变革的实际程度；

第三，内部乡土资源开发、利用和转换的程度，决定着村庄对外部资源利用的可能性和程度；

第四，乡土社会结构有没有弹性或者开放性，以及程度的强弱，影响着村庄接纳和融入外来要素的可能性和程度；

第五，社区内聚力的强弱，既决定着村庄摆脱大社会控制的能量，也决定着村庄对大社会开放的程度。

经过对超级村庄与其周边相对落后村庄的比较，以及对不同类型的超级村庄之间的相互比较，我们发现，就其本质来说，超级村庄的发展是一种内源性发展。这是因为：第一，超级村庄是在内部条件不断成熟的条件下产生的，而不是行政力量推动的结果。在我们调查的村庄中，发展都表现为一种渐进的过程，他们或者在改革前或改革初期就通过农业、副业、手工业等完成了最初的资金积累，或者在改革开放后引进低水平的、初级的工业，以此积累资金并学会如何经营原来专属城市的非农产业。在这里，外部的要素正是通过与逐步成熟的内部要素的结合而对村庄产生影响，而不是作为内部要素的对立物出现的。第二，变革的动力来自村庄的内部，村庄是行动的主体。在非农化过程中村庄始终作为行动的主体出现，而不是作为城市工业扩散的客体存在的。几乎在所有的发达村庄，我们都可以看到主动地“请”工业进村的情形。在多数村庄，请工业进村是一个试错的过程，从开始的“饥不择食”，到有意识地选择最适合的产业，但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挫折，村庄始终在努力主动地寻找机遇，把握自己的命运。村庄变革的倡导者是村庄内部的居民，他们或者是多年管理村庄事务的权威人物，或者是改革以来迅速适应了新形势的社区精英，正是这些人，主动将非农产业引入村庄，在村庄中创造了适合于这些产业生长的小环境，并且不断地

进行产业改造。第三,超级村庄的发展是对其内部的乡土资源,包括土地、人力以及社会性资源等充分开发和利用的结果。工业化过程中,村庄的产业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虽然有限,但它还拥有一笔丰富的具有影响外部资源配置作用的社会性资源。对这一笔资源的充分开发和利用,使超级村庄得以获取原本不属于乡土社会的各种外部资源,如产业信息、技术、人才、政策以及其他社会性支持,得以培育和发展出新的非农经济力量,参与大社会的经济竞争。第四,引进工业时,乡土社会的遗产与工业文明之间虽然存在许多矛盾,但是在更多的方面它们相互接纳并相互融合,说明村庄传统社会结构具有相当的包容性。在超级村庄发展中,乡土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及价值观念的变化不是通过激烈的冲突完成的,而是在这种相互接纳与融合的过程中逐步发生了变化。一些乡土社会的遗产被保留下来,通过与外部要素的巧妙结合,它们不仅没有成为发展的阻力,反而使村庄的发展有如水到渠成,自然而顺畅。第五,村社区与外部大社会之间的关系和联结方式,显然并不完全取决于外部力量的强弱,也取决于内部社会性资源开发和共享的程度。超级村庄的发展,似乎也印证了这样一些看法:社区的内部聚合、冲突和开放是内在统一的,是因为聚合而冲突,为了开放而聚合,依靠聚合而实现开放;^⑩90年代中期以前,乡镇企业发展最重要的优势不在于它最能利用市场机制,而在于它最能摆脱国家计划控制,^⑪其社会动力正在于乡村社区共同体在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发育和成长。

内生的“非农社会经济区”

从内源发展的观点看,乡村工业化,虽然是在城乡分割与体制分割这样一种双重二元结构背景下开始的,但也是农民认识到现有体制既限制他们进入城市,又提供了将城市资源引入农村即“请

工业进村”的机会的情况下,利用本土的优势,在村庄集体地实现向非农转化的主动选择。因此,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一开始就走了一条“就地转移”的道路,“以人人不向城市集中而把工业拉进农村,使农村里的剩余劳动力可以向自办的工业转移。通过农村工业化来改善农村经济状况,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①。这种农村工业化过程,被称为城乡联系的过渡模式,自70年代以来已经持续了近20年。农村工业化在传统的农业地域上发展出一批独立于农业之外的非农产业,使作为现代社会要素的企业进入传统的农村社区。人们用“异军突起”来形容它们发展的气势和给原有社会经济体系带来的震动,甚至将农村的非农产业称为“第二国民经济体系”,表示它已经达到与国民经济体系同构的水平,又说明它对于提高国家工业化水平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一些研究者注意到,近年来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对于它所在的农村社区来说并不是由外部强制注入的陌生物,而是在农村社区内部由农民主动创造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乡镇企业不是外来的,而是内生的。^②我们进一步注意到,在村庄中内生出的非农经济形式,与其他类型的乡镇企业比较起来,最大的不同之处,是有着更为深厚而贴近的乡土社会基础。它们与村社区的社会结构紧密相联,交织融合成了一种新型的非农社会经济结构。这个结构是非农经济和社区实体的结合物,既是一种经济构造又是一种社会构造,既不同于单纯的企业组织又不同于单纯的社区,既不是城又不同于乡。在空间形态上,我们又称它为非农社会经济区。这类社区除去一般社区所具有的地域性、生活共同体等等特征之外,还包含了大量的经济要素。在这里,社区不仅意味着行政区划、共同生活的地域或共有的文化,还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结构。同时,它又与一般的工业小区截然不同。它是在原有的农村社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济要素不是从外界强制注入这一社区,而是通过内外

结合的自我发展不断生长；企业与社区间的关系不是相互独立或相互隔离，而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原来农村社区的社会关系并未遭到大规模的破坏，而是被相当多地保留下来。超级村庄就是这样一些在乡村社会中内生出的非农社会经济区。

社区经济，是这个非农社会经济区特有的经济类型。它与国民经济或主流经济有密切的关系，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有自己内部的经济调节机制，不至于在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时首当其冲地被“大”经济吞没；它不受国家财政的支持和产业政策保护，具有农村社区居民自治的性质；它在经济上已经深深地参与了宏观经济体系，但仍以村社区为其基本的利益边界。作为经济形式，它具有现代企业组织经营和管理的基本特点，但是作为社区性的经济，它又具有社区的社会特征。它不仅是一种乡土性的、受到特定社会关系制约的经济构造，而且还是一种社区性的保护性经济，内部不但有受保护的产业和职业，而且有产业、行业、收入分配、扶贫救助等方面的调节政策。

社区合作体系，是这个非农社会经济区的内部组织方式。这个非农社区的运作主体，不是由外来行政力量赋予权力的政府，而是由村民经过再组织建立的合作体系。不过，再合作不是一个纯粹自组织的过程，公社体制的遗产——村组织和村集体，经过改造后仍然是新的合作体制运作的支柱和内核。再合作也不是一个“再集体化”的过程，而是在逐步明确包括村民家庭、村民团体、小村集体和大村集体的产权关系和独立经济利益基础上的再合作。作为经济构造，它是社区经济的一个重要面相，是社区经济的组织形式。作为社会构造，它是一个由熟人社会的长期利益和现实实践中的即时利益相互结合而成的社区合作体系，一种“社区共同体”形态，具有社会保障和社会支持系统的功能和作用。无疑，村集体合作体系是推动超级村庄持续发展的重要社会经济机制，它在促使村庄在

经济上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有效地推动了村庄的社会发展。

社区行动规则,是这个非农社会经济区内部秩序的维持手段。在这个非农社区中,有自治自律的社区公共秩序,维持的手段,既不是纯粹外生的法规和市场原则,也不是纯粹内生的社区规范和文化价值观念,而是由“群定”的、经过内外生规则相互融入磨合而成的规则体系。这一套有特色的内外融合的规则体系,既帮助村庄实现内部自治,又使它易于参与外部大社会的竞争活动。

内源的“自然城镇化”

有关现代化问题的经典研究告诉我们,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一对相互关联的不可分割的历史现象。这种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工业化会促使农村居民向城市迁移。发展研究中的“依赖理论”也似乎印证着这种看法,认为受到中心(或都市)制约的“边缘”(或乡村)难以摆脱萎缩和长期落后的命运。按照这些理论预设,处于边缘末端的村庄,前景无疑是暗淡的,终将走向消亡。然而,从内源发展的观点来看,这些理论预设却是值得反思的。

黄宗智在研究 80 年代中期苏南乡村工业化问题时,注意到“80 年代的小城镇发展主要是由大量的白天在城镇工作的村庄居民促成的”,认为这种情形是国家控制农村向城市移民的种种限制性政策带来的必然后果,“这无疑意味着尽管有了乡村的工业化,总体来说农民仍被限制在村庄里,农民受雇于工厂并不意味着迁居到城镇,而且有的新工业点就设在村庄里,并非设在乡政府所在的中心地点。其结果是出现了大量的半工半农的村庄”^⑬。这种现象被概括为“不含城市化的工业化”。

这种概括显然注意到了中国乡村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不同步性(这里所谓的“城市化”是指农村人口向建置城镇的移民),但是却并没有能够注意到不同于“农村人口向建置城镇移民”的另一种城镇